

新时代视域下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研究

赵博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168)

摘要: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与传播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建筑典籍的外译在新时代应具有符合当代社会价值的理念,并符合译语国家的文化需求,满足其社会需要。因此,新时代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从宏观角度应以目的为导向,从微观层面要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构建目标文本。对建筑典籍的外译现状与传播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中国建筑典籍在新时代视域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期促进建筑典籍的外译与传播,构建中国建筑文化、建筑思想的国际性格局。

关键词:建筑典籍;翻译策略;建筑文化;建筑思想;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赵博.新时代视域下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1):86-90.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与手段,翻译不仅是通过语言转换的方式使本国人了解外国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借此方式来推动本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从总体上说,人类文化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融汇,是文化交流的产品。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文化也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建筑典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也使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与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传播范围。但是,中国建筑典籍文本中的语言表达特点、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及其文本背后的语境含义与背景知识给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源语与译语之间的这种超越语言层面的差异使得译文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完全对等,给目标读者造

成了阅读障碍,致使其难以理解文本的准确含义。如何使目标读者真正理解中国建筑典籍的语言与文化内涵,进而使其所蕴含的丰厚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得到传播,是新时代中国建筑典籍译介与传播的重要任务。笔者以新时代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目的与语言特色为主要参照,分析了建筑典籍翻译的文本特点与翻译方法,探究了新时代视域下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与传播。

一、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研究概述

1. 国内外关于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的研究

中国建筑典籍最早的对外传播出现在17世纪,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对中国建筑典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这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大量的译者,尤其是法国译者,诸如一些

传教人员、汉学家或者擅长中文的专家,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经典的建筑典籍。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译者所做的翻译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翻译,他们更多关注的只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技巧与建筑手法,并没有涉猎建筑典籍中所传承的建筑思想、建筑理念,也很少注意中国建筑典籍中蕴含的一些建筑史学观,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中国建筑典籍的全译本,这些译者只是选取典籍中的一些内容从语言层面上进行摘译或阐释。

从国内对于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来看,国内的中国建筑典籍对外翻译大多始于20世纪,最初主要是以建筑史学家或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建筑典籍所做的注释或节译为主,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将中国建筑典籍进行了整理与编撰,进而以此为研究基础,翻译其中的内容,进行建筑文化的对外传播。梁思成^[1]于1954年提出了建筑“可译性”理论,他认为,“不同地域、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有‘同一’的共性,也就是,为了同样的需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们不应放弃从历史中寻找‘可以保持中国固有之建筑美而同时又可以适用于现代生活环境’的建筑样式,应当掌握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建造出具有本国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国内译界开始积极投身于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工作。但是由于文化与思想的差异,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部典籍的理解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且使用的翻译方法也千差万别,影响了中国建筑典籍的对外传播,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会对全球建筑领域的知识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窗口。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在数量与规模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建筑知识与建筑文化思想仍然深藏于建筑典籍之中,犹如未被发现的金子,这既不利于世界了解中国建筑文化与建筑思想,也

是中国建筑文化“走出去”的一大障碍。

2. 新时代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研究

当前,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成果越来越丰硕,并且也开始兼具系统性。从本质上看,中国建筑典籍的内容不仅是对建筑知识的总结或是建筑技巧的描述,更多的是传达中国建筑文化与建筑思想,且语言表达具有一种文学色彩,这与西方的科技典籍有着巨大的差异。相较于西方对建筑典籍的翻译研究,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研究仍然处于起始阶段,目前仅限于对个别建筑典籍中的部分内容的外译,例如《营造法式》《考工记》《清工部工程》《营造法原》《园冶》等,而且翻译研究的焦点仅限于使用何种翻译方法对文本进行语言层面的内容转换。尽管如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影响下,中国建筑典籍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经典,其翻译可以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在这种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中的任何要素都会被纳入建筑典籍翻译研究的整个框架,为未来的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提供思想依托。

二、中国建筑典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准确的翻译实践源自恰当的翻译策略的使用,翻译策略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转换的重要手段。“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宏观层面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2]因此,中国建筑典籍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既涉及选择何种文本的问题,也涉及语言转换的目的、译者主体性、文本类型研究等多方面问题,需要对这些方面逐个进行分析,找出恰当的策略与方法进行语言转换。

1. 建筑典籍的选择

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并非简单的翻译工作,而是一个巨大而繁琐的系统化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条理清晰、计划明确、分步进行。因此,在选择何种建筑典籍作为外译文本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需要选择那些

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思想的建筑典籍。与此同时,在建筑典籍外译过程中,也要时刻了解译入语国家和读者的社会与情感需要,研究其对于源语文化的期待。例如,在建筑典籍的翻译选择中,需要挑选可以呈现中国建筑文化甚至全球建筑文化发展历程的经典文本,丰富世界建筑文化与建筑科技的研究。另外,多数中国建筑典籍时代久远,很多建筑专著有多种版本,如《考工记》《营造法式》等,因此,译者在译前准备过程中需要仔细考据,从中选择最经典的版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典籍中的一些内容可以加入自己的考据理解,增加校对内容,结合权威的建筑典籍的初本着手翻译。

2. 目的为导向的宏观翻译

(1) 翻译目的下典籍的语言规律

任何行为都出自于一种目的,目的是一切行为与活动的基础。翻译不仅是言语与非言语的交际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人类行为。任何翻译都有一定的目的,或者说都要实现一定的功能。“翻译活动就是在目的语中寻找与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对等话语的言语交际活动。”^[3]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在其专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中援引了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翻译观,弗米尔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翻译单词、句子或篇章,而是引领目的明确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使得以功能为导向的交际行为得以成功”。

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也决定译者在翻译行为过程中所选择的语言转换方式,这会直接影响译本的产出。相较于科技实践(即通过预设实验参数、消灭外部干扰、高效率的实践介入等方式获取科学性的量化实验结果),翻译实践无法通过这种预设的计划方式进行,只能融入繁杂的跨文化、跨语境的社会活动过程,通过融合译者的经验、文化背景、知识储备、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实现翻译行为的预期目的。虽然翻译行为在目的层面上带有一定的指导性功能,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进行语言转换、

语境置换等行为时由于受到自身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影响,其产出的译文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2) 建筑典籍外译的目的导向

与其他领域的中国传统典籍的外译相似,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也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通过中国建筑典籍的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思想会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世界性的建筑文化与建筑思想。同时,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建筑典籍的翻译“以当今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是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要素的充分阐释与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比传达建筑信息更有意义”^[5]。

翻译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导向,在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研究中,科技典籍的外译,尤其是建筑典籍外译的焦点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将原文本的内容有效地译出并对外传播。“建筑典籍具有钩沉历史、重建民族自信和构筑民族形象的特殊时代功能,因为典籍翻译最终会形成关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和评估,……会改变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识,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6]中国建筑典籍外译的重点不仅是文本内容的准确传播,更是中国建筑典籍所内含的东方传统建筑史观、建筑思想以及中国建筑典籍的文献意义与价值的对外传播。“翻译的终极目标是译本能走进目标语读者,为其所接受并对其认知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新时代国际传播战略大背景下,翻译被赋予更宏大的历史使命。科技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应契合国家文化战略发展需要,不仅关注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策略的制定等本体性问题,更应关注翻译产品的传播和接受效果”^[7],这为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在总体翻译思想与翻译方法方面给予了引导。但并非所有的译者都具备建筑领域的知识与背景,因此,译者可与建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或者具有建筑领域实践经验的技师合作组成翻译团队,使语言与建筑思想有效结合并进行对外传播,展现中国建筑典籍的

人文价值,确保目标文本的信、达、雅。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目标读者对于源语典籍的全面认知只能是通过阅读典籍的全译本这种方式,但中国建筑典籍语言表达晦涩,其中所蕴含的建筑知识极其专业,目前对于中国建筑典籍的全译并不能有效地将其中的文化思想尽数传达。因此,可选取原文本中的部分篇章,如最能够展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内容进行节译,或通过注释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这样,目标文化读者通过阅读部分建筑典籍的外译篇章对中国建筑典籍所蕴含的思想与价值有所了解,从而为未来的全面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目标文本构建下的微观翻译

(1) 建筑典籍的文本混合与翻译

“翻译研究是宏-中-微相统一的系统性研究:宏观核心理论要有中观策略的过渡,在中观策略的关照下微观技巧在操作层面上发挥作用。”^[8]翻译在本质上是语境下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语言转换既是宏观层面的文本对比分析,也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的过程从宏观层面对对原文本传达的内容与思想的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分析出原文本所传达的具体内容与思想精髓,进而运用微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将解读过的原文本通过具象化的目标文本传达其中的准确含义。中国建筑典籍本质上属于科技典籍,因此,其文本呈现出很多科技类文本所独有的特色与属性。对建筑典籍的翻译需要在目标文本中表现出其所独有的这种科技属性,以此为基础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进行语码转换。翻译操作时,需要充分认识中国建筑典籍文本的基本属性,制定相宜的翻译策略,体现其“科技性”的核心特质。中国建筑典籍翻译需要关注诸如原文本中的术语、原文本的语言特色、原文本的一些文学特点、原文本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说,建筑典籍中含有大量的建筑类术语及专有名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整合原文中的术语体系,在目标文本中构建出

译入语的术语体系,两相对比,既有独立性,又不失对应性,使得原文本的翻译在目标文本的呈现过程中既规范又具体,既系统又具有逻辑性。相较于其他科技类文本,建筑典籍语言表达同样具有客观性与准确性的特点,因此,建筑典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要尽量在目标文本中呈现出科技文本的语言表达特点。

(2) 建筑典籍翻译的哲学观

中国建筑典籍除了具有科技文本的语言特点外,其文本还带有一些文学特点,如《营造法式》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内容,《营造法原》和《园冶》中也引用了一些文学典籍中的内容。这些引用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建筑典籍的一定文学价值及美学特点,反映了典籍作者思想中的科技意识与文学思维的紧密结合。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在语言表达中体现原文内容的客观性,还需展现原文中文学语言的表达特点,使译文在语言表达中既不失客观性,同时也融入一些文学性,实现翻译文本的信、达、雅。中国建筑典籍还富含深刻的哲学观与哲学精神。中国建筑文化为建筑典籍中的哲学思想提供滋养,而建筑典籍中的哲学思想反向指导着建筑技巧与建筑实践。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德”“礼”、孟子的“性善论”、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哲学思想成为构建中国建筑典籍中的哲学观与道德意识的基石,这些哲学思想在建筑典籍中得到了良好的展现。对于中国建筑典籍中所蕴含的这些经典的哲学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尽量按照已有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借鉴已有的官方译法,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另行翻译,以免影响这些哲学思想的语言构建。

4. 文本翻译的译者主体性介入

“在英汉转换中,有时在传递相同信息或相同目的时,由于表达方式的差异,无法在目标文本中找到对应的句式,为了更好地展示原文的含义有时候会在目标文本中增加一些表达,使译文能够更加符合原文的真实含义”^[9],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作为翻译行为的

主体——译者主体性的介入。中国建筑典籍中所蕴含的建筑理念、文化思想、建筑语言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建筑典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建筑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优秀的建筑典籍译者需要同时具备传统文化素养与专业知识,既能通过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发掘建筑典籍中的传统思想、传统理念、传统技巧,又能通过其所具备的现代知识体系将典籍中的重要内容融会贯通,提炼出传统建筑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例如,对于中国建筑典籍中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内容,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会通过进一步阐释的方式在译文中对原有内容进行补偿性解释,这种“厚重翻译”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另外,译者还应具有全球化的视角,了解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底蕴、知识结构以及客观需要,尝试发现原文读者与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各自文本时的反应,进而了解其在接受各自文本时所产生的共鸣与共情,最终找出适合建筑典籍翻译的具体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主要意旨是满足目的语文化的某种需要,弥补目的语文化中的某种缺省。因此,翻译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应是考查翻译活动在文化意义上的效果,即翻译行为对目的语文化的各种影响,这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目标”^[10],要达到这个要求,译者必须要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了解并掌握目的语语境下翻译的各个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史学观、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目标语表达方式等。双语文化因素虽然对译者的翻译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译者可以通过对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断加深认知,找出可以应对这些影响的策略与方法,进而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并介入其中,有效发挥自身的译者主体性。

三、结 语

中国建筑典籍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与文本特色,其外译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建筑思想以及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具有非常重要

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相较于其他传统典籍外译的蓬勃发展,如哲学典籍、文学典籍、思想典籍等,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到目前为止仍然为数不多。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建筑典籍的外译及对外传播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从翻译实践等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建筑典籍外译与传播需要关注的是建筑话语的翻译建构、建筑文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建筑思想的传播方式以及典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等,这些都需要更加深入的翻译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在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建设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循环互利关系。新时代视域下,中国建筑典籍的外译与传播可以有效地建构起中国在建筑科技领域的翻译话语、传播中国传统建筑思想与建筑文化、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地位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修订版)[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 [2]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J]. 中国翻译, 2014(3):82-88.
- [3] 莫爱屏.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路径[J]. 中国外语, 2011(3):88-94.
- [4] 芒迪.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 李德凤,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 [5] 肖娴. 科技典籍英译之文化译译:以《园冶》为例[J]. 上海翻译, 2019(3):55-60.
- [6] 王宏印,荣立宇. 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1-6.
- [7] 王翠. 论新时代中国农学典籍的翻译与传播[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18-23.
- [8] 方梦之. 翻译策略的理据、要素与特征[J]. 上海翻译, 2013(2):1-6.
- [9] 赵博. 语料库视角下英文小说的比喻解读与翻译:以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小说《店员》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4):407-412.
- [10] 何立芳,李丝贝. 道教典籍语言隐喻认知特征解析与翻译[J]. 外语学刊, 2016(4):99-103.